

Thoughts on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the new era

Hong Chen

Yanchi County Medical Insurance Service Center, Wuzhong, Ningxia, 7515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have undergone multi-stage evolution, achieving a historic leap from broad relief to targeted poverty eradi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have shifted from "survival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with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core tasks, goal orientation, and challenges fac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explores solutions around the five revitalizations of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 and clarifies the key relationship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se areas.

Keywords

new era;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ree rural issue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新时代下脱贫地区“三农”问题的思考

陈宏

盐池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中国·宁夏 吴忠 751500

摘要

建国以来, 中国扶贫政策历经多阶段演进, 实现了从广义救济到精准脱贫的历史性跨越。进入新时代, 脱贫地区“三农”问题已从“生存性”挑战转向“发展性”挑战, 核心任务、目标导向与面临的挑战均发生深刻变革。本文通过回顾我国扶贫政策发展历程, 剖析脱贫地区“三农”问题新特征, 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探索解决路径, 并明确需处理好的关键关系, 为推动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时代; 脱贫地区; 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1 引言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建国以来, 我国始终立足不同历史阶段的国情实际, 不断调整优化扶贫政策,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021年, 我国正式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 脱贫地区的“三农”工作重心从“解决温饱”转向“实现富裕”, 从“单点突破”转向“全面提升”。在此背景下, 深入分析脱贫地区“三农”问题的新内涵、新挑战, 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 对于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作者简介】陈宏(1967—), 男, 中国宁夏盐池人, 本科, 高级经济师, 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 建国以来我国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2.1 计划经济时期的广义救济式扶贫(1949年—1978年)

建国初期, 国家面临积贫积弱的困境, 农村普遍贫困是主要社会特征。此阶段, 扶贫并未作为独立政策存在, 而是嵌入整体社会经济制度中, 以“生存保障”为核心目标。1950年代初, 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实现“耕者有其田”,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关系, 极大解放生产力, 有效缓解了极端贫困; 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 依托集体经济建立“五保”制度, 通过“工分制”和口粮分配, 在低水平上保障农村人口基本生存, 同时针对自然灾害和特殊困难群体, 由国家财政直接拨付救济款物, 形成“兜底式”救济体系。

2.2 体制改革推动的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年—1985年)

随着改革开放启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扶贫的核

心驱动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打破“大锅饭”格局，极大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减少。这一阶段的扶贫并非专项行动，而是通过体制变革释放生产活力，实现“普惠式”减贫，为后续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

2.3 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1986 年—2000 年）

随着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农村发展差距逐渐拉大，“涓滴效应”减弱，区域性贫困问题凸显。国家首次将扶贫纳入专项工作，成立专门扶贫机构，启动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计划，政策核心从“输血式”救济转向“造血式”开发。期间，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及基础设施建设（如修路、通电、饮水工程），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承诺用 7 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推动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大幅减少。

2.4 深化综合扶贫与巩固成果（2001 年—2012 年）

此阶段，扶贫工作从“贫困县”下沉至“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策略，实现扶贫精准度的提升。同时，构建多元化扶贫体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贫困人口就业技能；推进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扶贫开发 + 社会保障”双轮驱动，为巩固减贫成果提供了制度支撑。

2.5 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2013 年—2020 年）

2013 年“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全方位、超常规推进阶段。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举措，举全国之力形成“大扶贫”格局，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机制不断完善。到 2020 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2.6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 年至今）

为防止返贫，国家设立 5 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实现“扶上马，送一程”。同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将脱贫地区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域，通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成果，推动脱贫地区迈向共同富裕^[1]。

3 新时代脱贫地区“三农”问题的新特征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脱贫地区“三农”问题已不再是“温饱不足”的生存性问题，而是转向“提质增效”的发展性问题，呈现出三大核心新特征。

3.1 重心转移：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与“发展差距”

过去，“三农”工作的核心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目标是消除绝对贫困；新时代，核心任务转变为防止规模性返贫，并逐步缩小脱贫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富裕。当前，部分脱贫地区虽已摆脱绝对贫困，但人均收入、产业水平、公共服务等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贫困问题凸显，成为“三农”工作的新重点^[2]。

3.2 目标升级：从“两不愁三保障”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阶段，“三农”工作目标聚焦“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进入新时代，目标升级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三农”工作不再局限于“底线保障”，而是追求“全面提升”，涵盖经济、生态、文化、治理等多个维度。

3.3 挑战变化：发展性难题成为主要制约

产业基础薄弱：多数脱贫产业存在同质化严重、产业链短、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以宁夏山区为例，部分产业因规模化不足或盲目跟风导致投资失败；盐池县滩羊、小杂粮，西海固地区小黄牛、土豆等传统优势产业，在种植养殖标准、市场对接、精深加工等方面存在短板，产出与收益不稳定，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

内生动力待激发：城市化进程中，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留守群体以老年人、低智残疾人为主，接受新技能、创新发展的能力较弱，仍依赖传统农业和打工增收；部分群众“等靠要”思想未彻底扭转，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意识不足。

人力资源短板：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21.1%，且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青壮年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创新、创业活力下降，人才短缺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关键瓶颈。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脱贫地区硬件设施（如道路、住房）已大幅改善，但物流、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以及养老、教育质量等生活性服务仍存在差距，难以满足农民高质量发展需求^[3]。

生态环境约束：多数脱贫地区位于生态脆弱区域，自然资源有限，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如何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成为重要挑战。

4 新时代脱贫地区“三农”问题的核心路径探索

4.1 聚焦“产业振兴”，推动农业从“生产导向”到“市场导向”升级

产业是脱贫地区持续发展的根基，需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一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农业+旅游、文创、康养”等新业态融合发展,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二是推动特色产业差异化发展,基于当地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避免盲目跟风,培育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三是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农户紧密嵌入现代产业体系,保障农民稳定增收^[4]。

4.2 聚焦“人才振兴”,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需构建“本土人才培养+外部人才引回+帮扶力量赋能”的人才体系。一是培育本土人才,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重点提升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数字素养;二是引回外部人才,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在就业、创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吸引大学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企业家等“新乡贤”返乡入乡;三是用好帮扶力量,推动驻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等工作重心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助力本土人才成长。

4.3 聚焦“文化振兴”,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奋斗精神

文化振兴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需实现“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一是强化思想引导,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方式,弘扬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的精神,扭转部分群众的依赖心理,增强其自我发展的主动性;二是保护与开发乡村文化,挖掘乡土文化、民俗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乡村旅游、文创产品的独特卖点,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

4.4 聚焦“生态振兴”,践行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是脱贫地区的宝贵资源,需探索“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的路径。一是发展生态农业,推广节水、节肥、节药技术,发展循环农业,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二是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积极探索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绿色农产品认证等机制,让守护生态的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

4.5 聚焦“组织振兴”,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组织振兴是乡村治理的保障,需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选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从致富带头人、返乡青年等优秀群体中选拔骨干;二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盘活闲置土地、厂房等资源,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壮大集体经济,增强村级组织为民服务能力;三是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提高村务管理、政策宣传、便民服务效率,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

5 解决脱贫地区“三农”问题需处理好好的关键关系

5.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需明确“引导者”和“托底者”定位,做好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等工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但不能大包大揽;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脱贫地区流动,让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提升竞争力^[5]。

5.2 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的关系

外部帮扶仍是脱贫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但需从“给予式”帮扶转向“赋能式”帮扶,避免形成新的依赖;所有帮扶措施均应聚焦激发当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技能培训、产业扶持、思想引导等方式,让群众从“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

5.3 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脱贫地区发展需坚守生态红线,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立足生态优势,探索绿色发展模式,将生态保护融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环节,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

5.4 巩固成果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任务,需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同时,将巩固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把脱贫地区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区域,持续给予政策、资金、人才支持,推动脱贫地区从“脱贫摘帽”向“全面振兴”跨越。

6 结论

新时代下,脱贫地区“三农”问题已从“生存性”转向“发展性”,是中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立足“五个振兴”探索路径,统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等关键关系。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内力、融入市场、绿色发展,推动脱贫地区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农业农村根基。

参考文献

- [1] 谢碧爱.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三农问题及其破局策略[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3,34(24):187-189.
- [2] 王曰尚.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J].中国科技投资,2021(17):39-40.
- [3] 杜诗蕊,周保吉.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联农带农问题研究综述[J].山西农经,2024,(13):1-4+13.
- [4] 张鑫宇.新时代背景下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实践路径探析[J].山西农经,2021,(03):15-17.
- [5] 吴万运.“三农”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5,40(06):86-92.